

日本極右勢力正在透支中國嗎？

7月1日,日本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了日本的集體自衛權。

確切說,僅就安倍內閣的這一次“政府解釋”,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事件本身,都不算特別重大的舉措。長期以來,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就一直處在憲法解釋的邊緣,圍繞所謂“擁有但不能行使”的立場,曾有過多次不同的“政府解釋”。雖然在50年代鳩山一郎內閣時期,60年代的佐藤榮作和70年代的田中角榮時期,其“政府解釋”都重申因憲法限制而不允許行使,但多是出于日本國內政治平衡的需要,並非國際壓力使然。同時,關於集體自衛權並不受修憲限制的輿論也漸趨轉盛,在90年代末期當時的小澤內閣就曾表示“即使不修憲日本也擁有集體自衛權”。

所以,從歷史沿革上看,安倍的這一步並未跨出太遠,不過就是明確了憲法並不限制集體自衛權行使這一呼之欲出的解釋,而新版的“行使三條件”,也不過是1954年出台的自衛權行使三條件的再版。

歸根結底,安倍今天這一步的真正意義,還在于對日本“和平憲法”的加速擺脫和背棄。

衆所周知,在日本戰後的歷史上,修憲運動,或者就叫擺脫和平憲法的運動,其歷史幾乎與和平憲法的歷史一樣長。從初期的“憲法強加論”、“憲法無效論”,到後來的“社會變遷論”、“戰後政治總決算”等論調,都曾為這個運動提供理論基礎。

2000年日本在國會參眾兩院分別設置了“憲法調查會”,自此以後,修憲運動已成主流,護憲運動不再成氣候。

今年的香港“七一”大遊行,算得上是一次標誌性的事件。參加人數到底多少暫且不論,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數已連續五年增加,而且情緒也一年比一年激烈。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Omena K 當天曾在現場,根據地的觀察:“雖然明目張膽的‘港獨’分子並非遊行主流,但觀乎以學聯、學民思潮、人民力量為主的中環留守人群,則‘本土’意味甚濃,其主調並非僅僅在普選中爭取公民提名,而是壓根兒就不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憲法。我就親耳聽到他們在台上高呼反政府的口號。”

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6月中發表的“白皮書”,對港人的反政府情緒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導致民衆偏向激進的人數增多,客觀上助推了香港的街頭抗爭。

然而若是反問:如果不發表“白皮書”,反對派會放棄他們的激進路線嗎?恐怕不會有人這麼認為,無論北京方面,還是香港方面,都不會。

同樣的問題也可針對台灣:如果北京政府在兩岸關係方面不作爲,台灣的激進政治就會自動退潮嗎?答案同樣會是否定。

港台激進政治愈演愈烈,顯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只拿北京政府說事,是有意誤導。事到如今,是時候把港台的激進政治當作一個特殊現象,認真進行梳理,看看到底是如何發展成了現在這個規模,這個勢頭。

動因之一:威權缺失

在香港,以中央政府為抗爭對象的激進政治,被認為是“回歸後”才有的事。從2003年反23條立法開始,每年都有大遊行,發展至今,不僅搞了“政改公投”,還要“佔中”,處處與中央對着干,大有不可遏制之勢。

但激進政治在香港的橫行,顯然並不只因中央政府。立法院里頻頻發生辱罵撕打、投擲器物的事件,最近又因不滿新界開發而暴力衝擊立法院,並非事事都因所謂北京“破壞香港法治”“打壓民主自由”而起。

在台灣更是如此,民進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熱衷于暴力鬥爭、街頭政治的激進主義政黨。如果說閻陳雲林、毆打張銘清、潑漆張志軍的確是針對北京政府,那么,多年來“立法院”里不時上演的全武行、美女與野獸,以及反核四社運、太陽花學運,竟至“立法院”被佔據長達二十多天,實際上就是民進黨激進的鬥爭主義黨文化長期發揮影響和作用的結果。

設想一下,假如沒有北京政府這個因素,港台兩地的政治近十幾年來又會怎樣呢?會和港英當局和蔣氏當局執政時一樣嗎?顯然不會!

很多人沒有正視這一點:港英當局和蔣氏當局都是不折不扣的威權體制,既具有強硬的壓制手段,又有軟性的懷柔措施,不會輕易任由經濟矛盾和社會不滿積累發展,演變成針對政府的政治鬥爭。對於這一點,港台的激進反對派自己心里比誰都清楚,當年香港的反對派沒有任何作爲,而台灣的民進黨只能在地下活動。

所以,歸根結底,港台的激進政治,與其說是在北京政治降臨之後的奮起反抗,毋寧說是在原有威權體制結束之後的乘

然而,修憲雖然擁有各種不同的名義,披挂着各種顏色的外衣,卻始終有一個最核心的陰魂,就是日本極右勢力幾十年堅持不懈所致力于的一個大目標:擺脫掉標誌着日本失敗的“和平憲法”、變相恢復標誌着日本勝利的明治憲法。

對於日本極右勢力來說,安倍這一次解禁集體自衛權,相當于“和平憲法”的進一步名存實亡,這也就標誌着他們的事業又推進了一步,距離大目標又近了一步。二戰結束後加在日本身上的各種束縛,已經一一掙脫,大日本帝國的昔日榮光,正重新煥發。

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志在重振大日本帝國雄風的極右勢力,正在藉助日本現實政治中的各種短期進程,一步步地接近其長遠的大目標。百年後再回首,和平主義死亡,軍國主義回歸!

應該認識到,在當今日本社會,日本極右勢力並不是主流,他們的終極目標並不能公開,他們的事業是一個隱秘日程(Hidden Agenda),因此,在推進其事業時,他們每一步都要順勢而爲、借勢而爲,通過製造虛假的目標,迷惑和劫持民衆和政府,利用現實政治中的進程採取曲線、變通的方式逐步地接近其最終目標。

港臺激進政治愈演愈烈的五大動因

勢而起!北京政府不過被當成了鬧事的藉口!

在香港,名義上港英當局的權力被中央政府接管,但實際上由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設計,北京政府並不能在香港建立起具有管治效力的威權。23條立法流產、中央意圖一再受阻,進一步擴大了管治真空。街頭出現英國米字旗,報刊上公開歌頌殖民政府,激進派與其說真的是在懷念舊時代,不如說就是在濫用毫無約束的自由——明知道英國人回不來了,又看到北京力量不能落地,不鬧白不鬧。

台灣也是一樣,民進黨不屬於成熟民主政治中合乎常規的反對黨,它既反政策,也反體制,既反執政黨,也反整個“國家”,屬於完全不守遊戲規則,可以濫用各種自由的一種“超級反對黨”。它以“台獨”理想為號召,以“賣台”的指控做武器,不僅成功分裂了台灣社會,也瓦解了國民黨任何形式的威權。今年3月的“反服貿”和“佔領立法院”標誌着台灣激進政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含義在於:今日台灣社會不接受任何帶有威權意味的施政,政府推出的政策只能在民衆的一致認同之下進行。一致認同形式的民主高於一切,既高於代議制,也高於法治。於是,也是不鬧白不鬧。

其實,這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威權長期缺失必然導致民粹大氾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這與真正的民主沒什麼關係。

動因之二:“影子政治”

當然,北京政府的影響,也不能不考慮。

近年來,隨着兩岸四地交往互動越來越多,儘管“一國兩制”、“兩岸分治”,但北京政府對於港台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仍然越來越大了,僅經貿往來和自由行,就幾乎到了影響無處不在的地步。

在一體化形勢的推動下,北京政府這個所謂的“威權”實體,就猶如一個巨大的雲朵,從過去的地平線之外慢慢飄到了頭頂上空,成了當地一個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馬英九的“馬省長”帽子,梁振英的“梁書記”稱謂,正是這一政治現實的反映。

然而,“雲朵”雖大,落在地上只有影子,於是一種“影子政治”出現了。沒有威權之實,卻頂着專制之名,豈不是自找“躺槍”?就這樣,原本只是當地社會內部的各種經濟矛盾和社會不滿,開始有了新的歸罪對象,一個政治化的出口,一個激發鬥爭的理想——“敵方”。

台灣爆發“太陽花民運”,香港的反對派前往取經;香港舉行七一大遊行,台灣的社運人士前來聲援;如同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般針對“影子政治”的“隔空戰爭”,在兩地迅速蔓延。北京政府的影響越大,惠顧政策越多,激進政治反倒越受到激勵。因為就其本性而言,這種政治只與權力的你進我退相關,不大受經濟利益的左右。

動因之三:革命傳統

“隔空戰爭”當然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號進行的,因為北京政府很容易被妖魔化爲專制獨裁的化身。

自由民主是先進的,專制獨裁是落後的,自由民主是優越的,專制獨裁是低劣的——人們對此深信不疑,無論激進政治多么出格,甚至把法治當兒戲,也會受到



以這一次解禁集體自衛權為例。可以肯定,他們不會真的在乎幫助盟國出兵這件事,甚至還會對美國背後操縱和利用日本心生反感,所以,解禁集體自衛權這個政治進程並不是他們的目標所在。但是他們還是會大力推動這一進程,促成解禁的實現,就是因為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一短期目標,與他們的終極目標大方向一致。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極右勢力迎來了社會大環境的總體改善,日本民衆中的和平主義信念遠不如過去堅定了,對於修憲已經沒有了以往那種強烈的抵觸心理。2001年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之後,公開主張“將來應該修改憲法第9條”,並於任內促成了“特措法”和“有事三法案”等法案的通過。自此以後,日本的現實政治進程,越來越與極右勢力的大目標合流。2005年,自民黨提出修改憲法序言部分的主張,以國際貢獻主義,繼承日本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尊重基本人權這個新的三原則,代替“和平憲法”中的國民主權、和平主義和尊重基本人權三原則,憲法的“去和平化”已成大勢所趨。

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環境和大趨勢之下,又一個新的形勢出現了:中國高速崛起,經濟總量超過日本

這種民主觀念的庇護,不受責備。這就叫“政治正確”。但激進政治不可能正確,如果認真追究一下激進政治的起源,人們就會看到真相到底是什么。衆所周知,在成熟的民主國家,激進政治沒有市場,民主在完善的法治環境下有序運行,儘管實行普選和政黨輪替,但絕少發生大的政治動蕩,更不會發生國家分裂的危機。

政治成熟、制度完善的主要體現之一,就是絕大多數社會矛盾都會被限定在社會領域之內,通過法律和道德解決,不會輕易上升到政治領域當中。但不得不承認,僅就政治領域的邊界限定和與社會、經濟等領域的分割這方面而言,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港澳台,都還算不上是成熟。這一點,在近幾年看得越來越清楚了。社會問題動輒政治化,所有不滿統統歸咎政府,大小問題一律指向體制,社會領域直通政治領域,中間毫無隔阻,正是兩岸三地共同存在的問題。

年輕人對經濟和就業不滿,原村民對開發和徵地不滿,都可以瞬間轉為激烈的政治活動,隨便找個理由就直接佔領立法機構,這種典型的“劣質民主”、“暴民政治”,在被認為民主法治已經實行得很好的台灣和香港,反倒愈演愈烈。

問題的根源,深植于中國的近代歷史當中。由於中國的現代國家建國是通過大規模的、暴烈的社會革命完成的,而不是通過“天鵝絨革命”這種只局限在政治領域里的政治革命完成的,所以,社會問題的政治化,恰恰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個強大傳統。早期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起源于民間社會,而不是國家政治的產物,都熱衷于自下至上的革命行動,缺乏自上至下的管治能力。諷刺的是,作為國民黨對立面而崛起的民進黨,卻又是一個更加民間、更加社會化的政黨,更加缺少成熟政治傳統,其黨文化就是早期革命黨的翻版。

共產黨信奉馬列主義,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民進黨信奉自由主義,三個截然不同的政黨,卻都是民間型政黨,不是國家型政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台灣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兩岸四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卻普遍存在社會問題政治化的痼疾。由此可見,政治領域缺乏邊界,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混成一團,不是主義的問題,也不是制度的問題,恰恰就是共同的近代傳統帶來的問題。**動因之四:民主觀念**

外人對此看得更清楚。《世界郵報》主編、《21世紀智慧治理》一書作者之一內森·鄧德爾斯在最近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葛蘭西(20世紀初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關於共產黨是民間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國家的一部分的論述。據此,他寫道:“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型政黨融合了兩種形式的霸權,開創了維持權力的新途徑,即模糊了強制力和認可之間的界限。”

作者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已經實現了從民間型政黨向國家型政黨的轉變,它正在試圖將兩種形

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巨大的變局被日本極右勢力當作了天賜良機。如果說推動日本朝野向右轉在過去還只是日本的“內力”單獨發力,那么,近十幾年來,藉助中國崛起的現實和隨之興起的“中國威脅論”,已經是“內力”和“外力”共同發生作用了。可以說,日本極右勢力深諳“借敵”之道,中國方面無論做了什么,都會被他們借過來當作“配合力量”,服務于他們的目的。

這就是日本近年來右傾化頻頻加速的根本原因。

就這樣,人們看到,無論是日本自衛隊的加速擴軍、大型艦艇下水、美日安保條約的強化,還是釣魚島“國有化”、解禁集體自衛權乃至修憲,這些內在地暗合日本極右勢力長遠目標的現實政治進程,無一不在應對中國威脅的名義下,得到了加速推進。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應該承認,日本極右勢力在利用中國這一“敵人”方面,正在取得成功,藉助愈演愈烈的“中國威脅論”,原本並無多大希望的目標,一個個輕鬆達到。

現在看來,不能指望日本極右勢力放棄他們的長期戰略,也不能指望日本社會停止向右轉。中國也有自己的長遠目標,不會因爲日本的過度反應而放緩前進的步伐。

重要的是,對中國來說,認清日本極右勢力對日本政治的成功操縱,以及在“借敵”方面對中國的透支利用,有利于準確判斷形勢,可以通過因勢利導,在中日之間的“東—東冷戰”中爭取主動。 **文揚**

式的權力融爲一體,一方面作爲國家型政黨強化國家的強制力,另一方面又作爲民間型政黨努力維係民間的認可。

現在看來,也只有中國大陸的執政黨,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和與國際接軌,逐漸具備了國家型政黨的能力,也逐漸具有了將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分割開來的主動意識和操作能力。而相比之下,港台的激進反對派,卻繼續沉浸在暴烈社會革命的傳統之中,在他們的主導之下,恰恰是港台,而不是大陸,越來越像“文革還在搞”。

而這個形勢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變。在港台方面,表面上擁抱了自由民主,實際上也接續了中國的社會革命傳統,但卻並未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反倒誤認為这才是相對於大陸的優越之處、進步之處,所以,決不肯自省和改正。而在大陸方面,由於中國共產黨從民間型政黨向國家型政黨的轉變是在“不爭論”的口號下、通過“摸石頭過河”悄然之間完成的,在轉變過程中,黨的名稱沒有改,章程和宗旨沒有改,只是變換了路線,調整了方針政策,所以,它又無法以“過來人”身份對港台進行忠告。恰恰相反,它的國家型政黨性質的強硬政策,反倒被妖魔化爲專制獨裁,被認為是抱殘守缺。

就這樣,在膚淺的民主觀念誤導之下,實質上的進步卻揹負着落後的名聲,實質上的優越卻被貶爲低劣。北京政府明明看到台灣和香港都在走向歧路、落入陷阱,卻無法進行規勸,因爲真正的道理不在官方話語體系之內,而官方話語在這方面的道理卻又自相矛盾。

動因之五:西方勢力

每當北京政府嚴詞警告西方勢力不要插手中國內政,總會引起港台反對派的冷嘲熱諷,說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但實際上,本地的激進政治,與西方的全球戰略在方向和目標上甚至步調上都高度一致,這是激進反對派最無法解釋清楚的一個問題。冷嘲熱諷容易,但敢說西方沒有任何“軟軀爭”戰略嗎?

只要承認西方有如此戰略,就可斷定其中必包含如此策劃:當對手國家實現了內部團結,就要策動其國內的“自由民主”,令其分裂和癱瘓;當對手國家實現了發展,就要策動其國內的“自由民主”,令其步伐減慢、發展受阻;總之,無論對手國家取得了什么,令西方感覺受到了威脅的成就,都可以通過“自由民主”這個武器發動攻擊,令其威脅減小。激進反對派們如何將自己原生的“自由民主”訴求與西方這個帶有戰略含義的、主動輸出的“自由民主”區分開呢?事實上,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做過這個區分,恰恰相反,他們似乎越來越不在乎公開成爲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於西方戰略家們來說,要想打擊中國,搞亂中國,港台的激進政治潮流,就是再理想不過的一個可以利用的工具。求之不得的威權缺失,歪打正着的“影子政治”,根深蒂固的革命傳統、懵懵懂懂的民主觀念,幾乎就是萬事具備了,只欠來自大西洋上的那一點西風。

這就是港台激進政治問題的五大主要動因,歸納起來,威權缺位放縱了它,“影子政治”刺激了它,革命傳統養育了它,民主觀念掩護了它,西方勢力利用了它,豈有不蓬勃發展、愈演愈烈的道理? **文揚**